

文本與田野：一個宗教人類學的考察

——評黃劍波《鄉村社區的信仰、政治與生活》

吳青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黃劍波先生的新作《鄉村社區的信仰、政治與生活——吳莊基督教的人類學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2）是作者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歷經九年修改、補充和完善，才貢獻學界的一部力作。黃先生接受過嚴格的人類學學術訓練，從事該領域研究十餘年，尤擅長對基督教進行宗教人類學的實證性研究。誠如作者在導論中所言，「作為世界最大宗教的基督教，國內人類學的研究幾乎還是一個空白，基督教研究中的人類學者聲音微弱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¹黃教授長期深入社區，充分利用田野資料，着力探究基督教社區信仰文化和生活個案，這在當今的基督教研究中，實不多見。²在這部論著中，他通過長期深入細緻的田野考察，為我們展示了基督教在一個集民間信仰、儒釋道思想和漢人宗族制度等

-
1. 黃劍波，《鄉村社區的信仰、政治與生活——吳莊基督教的人類學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2），頁9。下文再引此書，只列出頁碼。
 2. 近年有學者從歷史學和歷史人類學路徑展開基督教社區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康志杰，《上帝的葡萄園——鄂西北磨盤山天主教社區研究（1630-2005）》（台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6）；張先清，《官府、宗族與天主教——17-19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北京：中華書局，2009）等。

多元文化處境中的生存實態。可以說，這項宗教人類學的個案研究無疑是鮮活、扎實，且值得期待的。

黃著最突出的特點表現為研究領域的開拓性、選題的精到性、方法的獨創性，以及選擇場景的合理性。如何進入田野，如何展開研究，如何將活生生的基督徒及其生活還原和呈現出來？這些問題都可以在該著中找到答案。就規模和深度看，迄今為止，國內鮮有可以與黃著比肩的宗教人類學研究論著。此外，該著堅實豐富的史料基礎與深入細緻的田野考察令其特色更具鮮明。黃著選擇中國西北渭河畔的吳莊作為田野考察和研究的對象。作為一個典型的漢人社區，吳莊既保存了儒家宗法制度的理念，也有耶、佛、道和伏羲等其他民間宗教信仰，多元文化雜處其間，長期共存。作者選取吳莊這個村莊作為田野調查的對象，其學科學術視域和研究對象選擇的精到合理首先值得肯定。

在黃教授看來，該著是一項宗教人類學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研究，而非「宗教的人類學」 (Religious Anthropology)。在其看來，後者是以人類學方法為手段，以宗教研究為傾向。而人類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關注「作為社會存在的人及其習得的行為方式」。³人是社會動物，離不開群體生活，需要與別人互相交往，需要一個能證實自我的「小社會」或信仰群體。為了深入了解人及其所屬群體，人類學需要進行田野工作。通過田野調查實踐和文化比較，從而建構有關人、社會和文化的理論。黃著更強調人類學中「觀察與比較」的研究視角，即對宗教信仰發生的場景、過程和意義進行綜合研究和闡釋，從而加深對人的理解。由此，該書主要通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的方法，來闡釋對吳莊基督教的認識過程及相關問題。田野工作的成果是民族誌

3.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第8卷，頁260。

(ethnography)，它是對一種當地文化事件和習俗的內部描寫。⁴該書採用民族誌敘事手法娓娓道來，給人的直觀感受是，吳莊故事的建構並非只有作者一人在場，而是多聲道、會談式的，既有吳莊基督教徒個體和教會群體的聲音，也有多種政治力量和經濟因素的參與，還有各種其他民間信仰的表達等，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過往論著只有書寫者在場，而研究對象置身事外的弔詭和表層傾向。立言者與被呈現者共處一隅，情景的立體性和畫卷的多彩性均可兼顧，其研究方法的獨創性已然明瞭。

宗教信仰與地方文化體系、社會政治經濟的密切聯繫，呈現出多重維度的象徵意義。在文化層面，該著獨具匠心，選取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對聯」進行研究，從而探討基督教文化信仰與儒家文化環境的關係，可以說，從農村春節對聯內容入手，分析村民文化信仰，顯示出該書田野工作的細緻之處。作者認為「通常被認為是背離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督徒們不但大量使用了本土文化的表達形式，而且比自認為持守傳統的非基督徒們用得更多。」（頁119）在作者看來，吳莊基督徒利用對聯來表達對上帝的信仰和感恩，傳遞出努力在古典文化中尋求基督教信仰的信息。作者的田野工作發現，該村的基督教對聯內容，折射出信徒們的人生觀、世界觀、財產觀、末世觀、婚姻觀及生死觀等重要理念，反映了信徒們奉行的價值觀，也成為基督教在吳莊除講台傳道、聚會分享之外的另一種重要的信仰傳遞形式。對聯在我國已經有逾千年的歷史，亦是我國一種傳統的文學形式。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每逢過年，家家戶戶都要張貼對聯，為春節增加喜慶氣氛，寄托美好祝福。吳莊的對聯大致分為七類，即壽聯、喬遷和建房、

4. 亞當·庫珀等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頁247。

聖誕節、春聯、喪事、婚事，以及普通的福音門聯。其中，福音門聯的數量最多。吳莊數量龐大的基督教對聯，所採取的不僅是對聯這個傳統形式，同時也有對其內容和理念的置換與改造。文中從「對聯」內容角度，討論了鄉村基督教的本土化策略和基督教在鄉村社會裏的倫理功能，並對基督教對聯中的文化交融與衝突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作者敏銳地發現，基督教對聯與儒家理念這兩者在一些重要領域和立場上存在着衝突和相悖之處。

應該說，該書對吳莊基督教對聯的研究是慧眼獨具且富有新意的。作者對「對聯」這種形式及其內容的剖析用力頗深。但在這部分獨創性研究中，作者關於對聯文化象徵的一系列分析存在着可以提升的空間。諸如農村春節對聯的書寫和張貼這個問題上，其實不應該漠視它可能存在的很多複雜性因素，尤不能大而化之，甚至是表面化理解。吳莊數量較多的基督教對聯是如何形成的？是否反映出有關村民真實的文化取向？作者的田野工作也說明，相當數量的村民對聯是由鄉村教師兼信徒身份的「伏叔」等少數人熱心替村民書寫出來，考慮到大部分村民並無能力書寫毛筆字的現實，這項「為民服務」的任務自然會落到極少數人身上，這項田野觀察無疑是真實的。「伏叔」等書寫者主要是從「基督教對聯集」這類宗教性文書中選擇抄錄，再由各戶村民拿回去張貼。在作者看來，這樣的行為和形式便充分反映出吳莊信徒文化信仰的特色。問題是這種潛在的假設能否真實反映村民的文化立場和態度趨向？在中國農村，書寫對聯者一般是當地的讀書人，往往整條村莊的對聯都出自一位或少數人的筆下，這些對聯的戶主一般並不特意關注對聯的具體內容，至於是否對仗、上下聯可否搭配、張貼位置等，更不甚措意。很多人在乎的僅僅是喜慶的形式，張貼對聯多數視之為過年

的文化象徵。若從符號論出發，對聯更可視之為一種相當重要、不可或缺的春節喜慶符號。真正細心斟酌對聯的內容取向、力求反映己意的人反而少之又少。農村社區與城市社區在這一點上存在着相當大的區別。如果以此作為文化信仰分析的特定視角，肯定需要把握農村社區那種真實的田野情態，體察個體與群體內心的真實需求與形式表達，人類學田野功夫最看重生態原貌，最忌諱錯位理解，更力求避免以己之意度人之心。講求細微體察、準確認知、恰當表述，理應成為宗教社區深度研究的當然要求。上述要求對深入探究吳莊基督教徒的內心世界別具意義。作者如能在田野考察中結合當地的文化傳統和特殊背景，就對聯的出處、對聯書寫者及張貼情況、村民對對聯的態度和看法等問題予以縱深性探究，「對聯文化」的研究則更為深入，也更具有說服力。

宗教儀式是該書對吳莊基督教社區研究的重要環節。儀式是群體的社會結構得以鞏固和持久的方式，儀式的象徵意義亦是支撐社會價值觀的基礎。⁵對於參與者來說，儀式的意義具有雙重解釋，它既有宗教意義又有政治意義，既有神聖意義又有世俗意義。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認為，「通過儀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於一組象徵形式的作業而融合起來，變為了同一個世界」。⁶我們對某一行為或某種文化現象的理解，如將其放在原來的脈絡（context）中予以解讀，透過對域內與域外宗教生活場景的了解，對日常宗教實踐與信仰生活的意義、象徵進行多重把握，則可以深化對不同社群間的理解。格爾茨曾以爪哇東部小鎮舉行的一次葬禮儀式作為民族誌素材進行了研究，他指出「儀式不僅是一種意義模式，也是一次社會互

5. 夏建中，《文化人類學理論學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頁332。

6. 史宗主編，《20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頁186。

動形式」。⁷格爾茨的理論對於深入研究宗教社區實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發意義。按照格爾茨的理論，吳莊的宗教儀式也可視為一種社會互動的形式。黃教授以參與觀察的方式多次參與這樣的活動，並在多處內容中加以描述儀式的情境，不僅限於群體性表現，也側重關注教徒個體，尤其關注教徒個體的內心體驗、情感變動和社會生活、家庭活動的深層意義與互動關係，為讀者呈現出村落社區原生態的宗教儀式情景。

如果將這項社區研究推向縱深的話，那麼，除了發掘宗教儀式的意義，還須重視教會與村莊、教會與信徒、信徒與信徒之間的互動形式——彼此評價、公眾事務心態、相互交往、社交與聚會等等。「人類學的區別性特徵就在於通過研究差異性文化來尋求認識普同性的人性」（頁13），這是作者宗奉的研究理念。通常而言，「差異性文化」不僅是指相對於儒家文化的基督教文化，而且也包括基督教文化中信徒個體的諸多差異分析。作者在強調吳莊信徒們的一致性行動、信仰、思想、生活方式的同時，對於不同信教村民之間存在的差別性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關注。該書關鍵章節運用人類學的方法，講述了一個基督徒家庭的生活史，對基督徒的一天、男女地位、家庭觀念和組織方式等問題都進行了深度觀察，尤其對家庭內部基督徒個體差異做了深描和探究。筆者以為，此類差異性探究的力度似乎還可以加大。

改革開放以來，大規模勞動力輸出，社會流動加劇，吳莊社區的區位特色鮮明（距離天水較近、距離省城較近等），愈來愈多的年輕人成批走出吳莊，出外打工，謀生的形式多種多樣，無時無刻不接受着城市文化的洗禮。與

7. 格爾茨，〈儀式與社會變遷：一個爪哇的實例〉，載《國外社會學》4（1991），頁52。

此同時，各類媒體，尤其是日益興盛的電視媒體，正潛移默化地改變着村民的精神世界和價值觀。這些時代性因素對於吳莊信徒結構、人數變化、講經方式等均會產生相當的影響，人類學更應關注的是社區個體在這種社會變遷中的不同取向，尤其是對其宗教信仰產生的衝擊性反應。黃著各個部分的研究，雖已關注信徒群體的整體取向，也曾以「伏叔」一家為例作過多角度觀察和描述，但是，尋求宗教信仰個體的差別性表現依然存在深度挖掘的空間，吳莊社區信徒個體的宗教尊奉程度、參與頻率、在場心態、排斥異己文化的情緒體現等方面，還可以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信徒個體與非信徒群體之間的心態對立、行為差異、倫理生活等方面，也還可以作深度勾勒。這種研究深度和取向的強化，正是宗教人類學最具精華、最有特色、最能彰顯人類學底蘊的努力方向。該書如能在這一層面不斷進取和拓展，學術的原創性魅力也將更清晰地得到體現。

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是田野工作基本形式，其基本功能是獲取文獻數據、體驗在場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感知研究對象的細微差別。正如格爾茨所言，「如果民族誌是深描，民族誌學家所進行的是深描的話，無論它是調查日記式的短文也好，馬利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報告書那種程度的長篇記述也好，不論它關於深描事例，決定性的問題是：它是否從遞眼色中分辨出眼皮的痙攣，將真正的遞眼色與模仿的遞眼色區別開來」。⁸換言之，關注細微，體察差異是人類學感知異己文化的上佳途徑。從這個意義上看，人類學應該是開放性學科，它並不排斥借鑒心理學、社會學和後現代史學等學科的有效方法，致力於更深入地獲取田野文獻，豐富田野文獻的信息含量。

8. 格爾茨，〈深描——邁向文化解釋學理論〉，載《國外社會學》1-2（1996），頁47。

尤其是上世紀九十年以來，後現代史學倡導的「語境」論、「話語分析」已經滲透到諸如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等學科，黃著如能借鑒這些收集、處理、使用文獻的新方法，用之於現場觀察和訪談，當會更能增強文本數據的鮮活性，豐富田野文本的信息含量。「話語」(discourse)是近年來學界常用的概念。「話語」的運用往往包含特定的價值預設，在實際的話語研究中，也往往體現出對於歷史現象不同的關照和認知視角，揭示出有別於以往我們所熟知的一些歷史內容。⁹巴赫金(M. M. Bakhtin)認為，作為一種言說或「表述」的「話語」，在任何時候都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其真實含義只能通過社會交往與對話實踐才能獲得。「實際上，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是在說話和聽話，而是在聽真實或虛假，善良或醜惡，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話語永遠都充滿着意識形態或生活的內容和意義。」¹⁰對於田野訪談而言，「話語」不僅僅只是訪談內容的記錄，訪談對象表達主題的意圖、策略、表情、手勢等，都是我們要關注和揭示的內容。在田野工作中，如能對採訪對象進行深度觀測，既重視採訪對象的陳述內容，又注意捕捉其表情、手勢等體態語言，將被訪對象的口語表達與非語言符號結合起來，既保留其公開的話語記錄，又儘量把握其潛在意識、難言之隱，尤其是體會其是否受到從眾心理的壓力，將單純語言分析與當時被訪者處境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分析與判斷。這種分析取徑所帶來的研究圖景，與往日研究論著習慣於將語言與處境，思想與現實分割處理，僅把訪談內容作為理解和評價

9. 黃興濤，〈「話語」分析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載《歷史研究》2(2007)，頁152-153。

10. 巴赫金，〈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載《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頁359。

其思想的舊有方式有明顯區別，從中可以看到某些過去被忽視的語言與意圖，思想與行為之間的互動所造成的複雜關聯。這對於加深研究的深度，拓展本項研究在學科發展中的創新性和貢獻度，當能提升一層，在方法學上，亦不失為一種創新性貢獻。

本書值得注意之處，主要有以下三點：

其一，本書第八章着重探討了吳莊社區的「國家在場」問題，論述宗教與國家建制的關係，弱勢的基督教與強勢的國家之間存在的衝突、妥協和共存。書中界定「國家在場」、「國家權力」、世俗思想力量、傳統信仰等問題似有過度比附和簡單化傾向，如喇叭=國家在場，支部書記的存在=國家在場，村委會=國家在場等。對於「國家在場」問題作如此簡單化比附，容易引起讀者的異議。改革開放以來，日益影響村民的媒介，如報紙、電視、電影、集市娛樂，甚至互聯網等媒體形式等紛紛湧現，「媒介帝國」不僅僅體現在城市，廣大的農村社區也愈來愈受其衝擊，淺層次的受眾，如廣大農民群體，在鑒別力、抵制力和穩定性方面，往往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因而，這類媒體宣介的內容傾向對普通民眾的影響不應該被忽略。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間，為作者研究的主要時段，正是在這個時段，即便是農村地區，電視媒體和口耳相傳的各類資訊也會給信徒們帶來思想觀念、認知方式、生活方式、宗教和道德評判的變化，深刻影響着作者選取的研究對象的思想、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作者田野工作的結構安排若能對這一類要素進行精心、科學地訪談設計和數據收集，那麼，相關部分的研究當會更加顯示出宗教人類學的特有魅力。

其二，「制度性宗教」與「普化宗教」問題儘管在書中進行了一定的概要性介紹，但是就作者研究的社區而

言，在對基督教人群的結構訪談中，恰好沒有深入地搜集用於分析信徒「信教動機」所需的數據，更缺少對這一問題的民族誌敘述。中國城市社區、農村社區的宗教信仰動機存在相當功利性成分，吳莊其實也並不例外，雖然吳莊基督教活動在形式是呈現「建制性」的，但是就平信徒的信仰動機和參會活動頻率、規律來看，難保不會湧現出一些頗有代表性的非宗教性動機信徒（臨時的，世俗追求的，功利性的），否則，後文所稱的「空堂」現象顯著化、在場人數銳減等現象，便很難僅僅從外出務工人員增多這一主導層面解釋。儘管作者在該書中總結了吳莊教會的世俗化現象，¹¹對於外出信教人員存在加強基督教信仰的個案也做了細描，並簡單闡述此類人員返回家鄉時對吳莊宗教講道的批評和影響。但是作者似乎忽視了下述幾個方面：在家鄉是平信徒，外出打工後，因各種原因，放棄基督教信仰的情形，卻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吳莊信徒到城市社區務工後，在參加城市教會活動的同時，也以各種形式和途徑對家鄉基督教信仰實踐施加影響；尤為關鍵的是，本村信徒由篤信基督教演變為放棄這一信仰、改變宗教態度等實際情形，應該着力進行分析。文中偏重討論「宗教強化」暗流，卻忽視了對宗教信仰弱化傾向的深度描述。黃教授對城市基督教社區素有研究，近年來又着力於研究農民工社群，或許在他的新著《都市裏的鄉村教會》裏，¹²筆者對農民工信仰問題的疑問和困惑都將得到解答。

其三，作者已有城市社區基督教研究經驗，關於吳莊社區研究，理應兼顧城鄉社區之有選擇性的比較（例如天

11. 吳莊基督教世俗化現象表現為：第一，信徒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第二，信徒年齡結構脫節；第三，實際聚會人數遠遠少於教會聲稱信徒人數；第四，信仰與生活實踐的差距。參黃劍波，《鄉村社區的信仰、政治與生活》，頁 201。

12. 黃劍波，《都市裏的鄉村教會——中國城市化與民工基督教》（香港：道風書社，2012）。

水社區與吳莊社區的關聯性比較)，以求得特定研究社區之準確定位；橫向之比較，亦可關注農村社區之特殊性場景和宗教文化之特殊性境遇。另外，吳莊這一個案的解釋空間究竟有多大？儘管作者不欲提供一種研究模式，但是嚴謹的宗教人類學視野中，並不排斥將研究的田野個案進行區域間的比較。這裏的「區域間」指的是同為農村社區，同為基督教社群，同處於一個開放寬鬆的時代，同類文化傳統之下，進行某類宗教現象、誦經講道、宗教對生活影響的比較等，這類比較可以是現象意義層面，也可以是行為取向方面，當然也可以是環境—行為—觀念方面的多重比較。須知，吳莊社區個案的研究意義實際上超出了個案本身的局限性，如何將這種「意義」、「象徵」、「符號」加以人類學的解讀，實際上亦是作者不應當拒絕的事功。

上述疑問並未抹殺本書的學術價值。尤其是本書所關注的吳莊普通村民和信徒，他們才是歷史的主角。在現代化不斷加速的今天，他們的信仰如同潛伏在大地下面的暗流。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痕跡，但是薪火相傳、綿延不斷，也最終成就了本書所關注的這段歷史。

關鍵詞：田野 宗教人類學 信仰 鄉村社區

作者電郵地址：annawuqing@hotmail.com

Text and Field: A Survey on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Review on Huang Jianbo's *Faith, Politics and Lives in a Rural Community*

WU Qing

Ph.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 History

Art College,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Huang's book chooses Wuzhuang, a village in Northwest China as the fieldwork place and research object. The book features its exploitation of research fields, the precise topic, originality of the methods, and the rationality of scenes selection. On the scale and depth, there are few religious anthropology research works to be compared with Huang's book until now. In addition, the rich historical accounts and detailed field investigation make the features more distinctiv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re the major forms of the field work. But in the field work, Huang's book could have done a better job in terms of the in-depth

observation, experience of the local culture, belief and life, and perception of the nuances of the people under research.

Keywords: Field; Anthropology of Religion; Faith;
Rural Community